書　評

評介《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

于　佳　靈**

書　　名：《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
編　　者：方秀潔、魏愛蓮
出版時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頁　　數：348 頁

一、性別與明清婦女文學的學術研究回顧——以北美為中心

北美學者對中國明清時期女作家的研究頗多，起步較早，且鑒於《跨越閨門》一書的作者大多活躍於北美學術界，

* 本文的完成，得益於衣若蘭老師主持的「明清女性傳記專題」課程，以及審查人對本文所提之修改建議，特此致謝。
**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以下簡要介紹北美學術界對明清女性文學的研究，並指出本書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和價值。[1]

以女權運動和女性主義的興起爲背景，北美學界對中國女性的研究主要開始於 1970 年代。該時期，學者主要致力於將往昔處於歷史邊緣而沉默的女性寫進歷史，並且揭露和批判傳統對於女性的壓迫，甚少關注中國明清的女作家。

而從 1980 年代後期，特別是 1990 年代開始，由於受社會性別理論的影響，北美學界研究中國女性的方法、視角與選題等方面，都出現轉變，跳出原有框架，開始關注婦女在特定歷史時代和歷史空間下的生活狀況和社會角色。在史料方面，學者擴大搜集材料的範圍，許多久已絕版的研究著作（例如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和二十世紀之前罕見的女性文集，得以重新印刷，使得研究者「重新發現」了帝制晚期的女性作品（主要是詩歌）和女作家。至此，關於中國明清女性作家的研究始得到學界重視。

1990 年代初，《帝制晚期中國》(*Late Imperial China*)半年刊出版了名爲「帝國晚期的詩歌和婦女文化」(Symposium on Poetry and Women's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一期特刊，爲此後明清女性文學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礎。此時期

---

1 本文學術史回顧主要參考：盧葦菁，〈美國中國婦女研究評述〉，收入張海惠主編，《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490-506；伊維德(Wilt Idema)，〈英美學界對歷代中國女性作家的研究〉，收入方秀潔、伊維德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婦女著述彙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20-48；方秀潔、魏愛蓮編，《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8-10。

關於明清女性的書寫在以下兩本重要的學術專著中也有提及：高彥頤(Dorothy Ko)的《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和曼素恩(Susan Mann)的《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或譯爲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高彥頤在《閨塾師》中，重點關注明清時期女性的文學活動，批判了認爲女性沒有讀寫能力的五四觀點。本書也可謂是當年少有能大量運用女性自己的作品，來書寫女性生活和自我定義的專著，但作者似乎並沒有進一步探討十七世紀女性作者所寫的詩文本身。同樣，《綴珍錄》的其中一章討論了十八世紀晚期女性從事的相關文學書寫活動。曼素恩在書中也反覆引用女作家的詩文，不過多半是用其支撐書中的觀點，而對詩文本身卻較少文學分析。

談及明清女性作家的論文集，我們以《跨越閨門》一書緒論中談到的兩部代表性著作——《書寫明清女性》(*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和《帝國晚期的中國婦女——新研究視角》(*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Leiden: Brill, 1999)爲例。這兩本書都涉及身爲作家的明清女性，但《書寫明清女性》中談到的作家以妓女居多，閨閣之中的女作家尚未得到充分討論，且該書文章多是通過男性書寫的文本，來建構理想女性及女性氣質，未有對女性書寫詩文的直接抒發；而《帝國晚期的中國婦女——新研究視角》

一書，也只收錄了兩篇與女作家及其著作直接相關的文章，對女性書寫文本的分析亦不足。因本書大部分文章成文於 2006 年的國際研討會，英文版原書出版於 2010 年，故本文對成書於 2006 年之後的相關代表性著作不再列舉。[2]

二、本論文集各篇論文之摘要評介

本書的出版背景可溯至 2006 年由方秀潔(Grace S. Fong)教授和魏愛蓮(Ellen Widmer)教授在哈佛大學舉辦的「現代視角中的傳統中國女性書寫」(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Through a Modern Lens)國際研討會。2010 年，BRILL出版社結集出版了其中 11 篇會議論文，這就是*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 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hrough Qing*[3] 一書。2014 年，本書的中文版《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出版發行。[4]

《跨越閨門》一書以明清時期閨秀才女自我記錄下的言

---

2 近年來，關於明清才女的研究也已經成為西方漢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多有優秀著作發表。例如，魏愛蓮《美人與書：十九世紀中國的婦女與小說》(*The Beauty and the Book: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張門才女》(*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方秀潔《女性詩作家：明清時期的社會性別、能動性與寫作》(*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等等。

3 Grace S. Fong and Ellen Widmer, eds., *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 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hrough Qing* (Leiden: Brill, 2010).

4 關於本書的出版經過請參看本書後記。方秀潔、魏愛蓮編，《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383-384。

行、思緒爲主要論述材料，學者通過分析、揣摩、解讀這些女作家流傳後世的詩詞散文，來建構明清女性的生活體驗與人生經歷。本書中的論文以多學科的視角，跨越文史，有的聚焦閨閣之內的女性疾病體驗，有的講述女性的編輯工作，有的向讀者展示女性如何走出傳統角色與回應現實政治。這一切都以顯示女性歷史能動性的詩文來駁斥、解構了晚清以來認爲才女消極、膚淺的固有成見。以下就本書各篇章內容進行介紹。

本書主要分爲緒論、正文和結論三大部分，其中正文則劃分爲「門內的世界」、「放開視野——女性與編輯工作」、「走出傳統女性角色」和「個人與政治——回應現實世界」四大部分，共 11 篇文章。

緒論爲方秀潔所寫的〈文本中有什麼？婦女文集的重新發現與重新審視〉，該文討論了明清婦女文集在上世紀八〇、九〇年代的重新發現，特別是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一書重新得到重視，使得明清婦女研究的重點和方向發生了轉變。方秀潔認爲高彥頤和曼素恩的著作，即爲明清女性研究的開拓性著作。她並指出孫康宜、管佩達(Beata Grant)、雷邁倫(Maureen Robertson)、魏愛蓮等學者，亦致力於女性文本的研究，各人從不同面向，勾勒女性文學與社交網絡、詩文編纂的脈絡，以及家庭、宗教生活的一些側面。對明清女性文本的深入研究，離不開對女性書寫文獻的掌握，爲了較易取得女性文集，方介紹了「明清婦女著作」數據庫的建立，及中國婦女著作的翻譯計劃。最終，作者提供學術史的反省，將本論文集與前此出版的兩部著作——《書寫明清女性》、《帝國晚期的中國婦女——新研究視角》進行比較，

闡述本書轉移視角，即關注女性自身文本實踐，其學術上突破的意義。尤其是，方秀潔從社會性別和空間性這兩個概念出發，總結本書的理論框架，並且提示了本書收錄各篇文章的大致內容。

第一部分「門內的世界」包括兩章。雖然此時所討論的女性寫作的場域還集中於閨閣之內，但女性書寫之內容，其詩文傳遞出之思想，卻已開始占據閨閣中的獨立空間。女性寫作開始遠離柴米油鹽和閨閣內瑣碎、繁雜的事物，頗有精神上的「跨越」之勢。

在〈書寫與疾病——明清女性詩歌中的「女性情境」〉一文中，方秀潔通過分析女性自主記述的關於疾病的詩歌，來探討女詩人對於疾病體驗的主觀感受，並和同時代男性所寫的同類題材的詩並舉，來觀察女性書寫疾病的特點。同時，作者指出，女性將與疾病聯繫在一起的柔弱，視爲與女性氣質相對應的表徵，並使得疾病具有審美化。作者將女性關於疾病體驗的書寫，劃歸爲不同的範式和主題，且以甘立媃的例子說明，對疾病的體驗與對疾病體驗的記錄，其含義會隨著女性的不同生命階段而發生改變。文章最後談及疾病帶給女性的特殊功效：它給女性提供了從繁忙日常雜務中脫身的愉快閒暇；它還可能幫助女性提高寫詩的創造能力，使女性獲得心靈上的寧靜與平和。女詩人甚至將疾病昇華爲特殊體驗，從而將女性帶入精神層面。

馬蘭安(Anne E. McLaren)的〈哀哭——明清時期女性悲情的表演〉一文，對前現代中國社會女性的哀傷「表演」進行了考察。作者首先介紹下層村婦的哭嫁、哭喪習俗與上層閨秀的悼亡詩文。作者比較了男女兩性在哭嫁和哭喪習俗

「儀式」表達中的差異，及女性在儀式表演中的特殊意義。爲準確評價明代女性的悼亡詩傳統，作者回顧了明代以前文人悼亡詩作的傳統。明代之前，少有出於女性之手的悼亡詩，但這並未如實反映世俗社會中女性在悼亡活動中發揮的作用。下文中，作者就以古代文獻中關於女性哀哭的記載，和中國南匯地區的田野考察，說明女性如何在悲情「表演」中表現哀悼與孝順，或是彰顯婦德。討論完下層女性，作者主要以沈宜修和薄少君的例子，分析明末清初閨秀的悼亡詩，並得出結論：女性悼亡詩歌中有情感的眞實流露，批駁了二十世紀以來把女性文學貶斥爲內容有限、表達不眞實的觀點。作者同時指出，詩文和喪葬歌所具有的社會價值，及在此過程中女詩人對悼亡詩寫作傳統的改造，並提醒我們注意男性對詩文的詮釋與女性自我理解之間的誤差。

本書第二部分「放開視野——女性與編輯工作」，主要探討了女性編輯文學選集，及女性文集被編輯出版等相關問題。對女性編輯而言，編輯文學選集使得女性「有機會進入一個非親屬關係的空間，並藉此獲得權威地位」，這也使得她們的活動空間跨出閨門，至少擴大至自己家外友人的交際圈子，這無疑可以爲其寫作和生活擴大視野。而對於女作家而言，文集被編輯出版，可能也使得其私人生活跨入公共領域。

〈重拾過往——1636 年至 1941 年間的女性編者和女性詩歌〉，研究的是晚明至民國時期由女性編選的女作家選本，分別是沈宜修編選的《伊人思》、王端淑編選的《名媛詩緯》、惲珠編選的《國朝閨秀正始集》、沈善寶編選的《名媛詩話》、單士釐編選的《閨秀正始再續集》，和冼玉清編

纂的《廣東女子藝文考》。魏愛蓮從編者背景、編纂選本的理由、收集或尋找材料的方式、選本組織的原則、編纂的水準等角度，對以上文本進行討論，並且在討論過程中揭示了：隨時代變化，女性編輯選本也發生了改變，且不同編者對女性傳統的理解不一。結論部分，作者回答了爲何要單獨討論女性選本特徵的問題，並闡明女性傳統的兩種不同趨勢：一種是關注保存女性作品，另一種則關注女性教育。

〈看不見的手——駱綺蘭及其選集的背景〉一文的第一節，介紹了女詩人、畫家——駱綺蘭的家世背景及其在文學藝術乃至廚藝方面的才華。接下來，在「文本與視覺展現」部分，羅賓(Robyn Hamilton)通過分析駱綺蘭編輯的兩本選集中涉及的部分作者——男性精英與才女，藉此來討論她的文學圈和社交圈。作者之所以探討駱綺蘭的交遊圈子，想必也可能是在嘗試回答：幫助駱綺蘭編輯文集的背後那「看不見的手」，究竟從何而來。毋庸置疑的是，駱綺蘭特殊的出身背景和令人敬佩的學識，是她能夠不受世俗約束，而能與眾多文人雅士交遊的重要原因。駱綺蘭直言不諱自己編輯出版文集的目的是爲求名，她公開批評社會對女性待遇不公的舉動，也顯示出其特別之處。

〈由私人生活到公眾展演——對清初女性吳宗愛的記憶建構與重寫〉，主要講述的是男性對女性作家作品編輯出版的過程。華瑋通過梳理吳宗愛詩集的出版過程，分析《徐烈婦詩鈔》中文本與副文本的構成，及戲曲《桃溪雪》中對吳宗愛的呈現，以此說明清初女性吳宗愛其人其詩如何在沉默了一百多年後，被男性文人重新發現、塑造，進而由私人領域進入公共視野。這一過程提醒我們：「女作家的生活和寫

作，是如何被男作家借用和改寫以便符合他們的需要。」[5] 發生於十七世紀的吳宗愛的自盡悲劇，被十九世紀遭遇內憂外患的文人官員賦予政治含義，加之重新出版的吳宗愛詩文集中「副文本」的增加，以及關於其傳奇經歷戲曲的上演，使得關於吳宗愛的記憶最終被建構起來，但上述一切可能與客觀歷史並不一致，或與吳宗愛在詩中表達的意思頗有誤差。

本書第三部分「走出傳統女性角色」，關注的女性書寫的主題和範圍，移到個人志向、戰爭與國家命運。明清部分女性的文本實踐，從內容到主題，都已開始質疑傳統女性的角色定位，展現出對閨閣的跨越。

〈明清之際的女子詩詞與性別界限〉，著重分析的是處於明清易代之際，身遭家國巨變的女性所寫的跨越性別界限的詩詞。她們的詩詞中表現出亡國之痛的悲哀、壯志難酬的無奈，和談兵說劍的豪氣。「亡國之悲」一節主要以王端淑的〈苦難行〉、〈敘難行〉、〈悲憤行〉等詩爲例，表現女詩人在遭遇世亂之時的家國之悲與歷史感懷。「壯志難酬」一節主要以女詩人劉淑的詩爲分析對象，展示了劉詩中對英雄志業的嚮慕，壯懷激烈的徒勞，英雄失路、報國無門的悲情，豪情壯志的失落，及超越性別的人生沉思等。「談兵說劍」一節則以柳如是、李因、周瓊和吳琪之詩爲例，討論「刀劍」這一意象的象徵內涵。「性別牢騷」的主題則在周瓊、顧貞立的詩詞中凸顯，其中飽含政治寓意。而女詩人們詩句中透露出的文字自覺和對書寫意義的思考，又恰恰反映出其「詩心覺醒」。

文人和僧人的交流自古有之，但舉止得體的女性，無論

---

5 方秀潔、魏愛蓮編，《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頁 348。

是閨秀，還是比丘尼，於禮法而言，二者都應生活在完全封閉的環境裡，彼此之間沒有直接的接觸。然而，禮法和現實之間總有空隙，閨秀和比丘尼成爲朋友的例子並不鮮見。〈禪友——十七世紀中國閨秀與比丘尼之間的詩詞交流〉一文的研究重點，就是明末清初此一時期由女尼創作、寫給女尼、或反映女尼生活的女性詩歌，同時關注閨閣女性與佛門比丘尼之間的詩文唱和。文中以申蕙、歸淑芬與女禪師一揆超琛，比丘尼谷虛與商景蘭、黃媛介等人的交往爲例，探討上述問題。文末管佩達指出，雖然比丘尼的生活清寂孤獨，但閨秀還是會羨慕她們擁有較多讀書、寫作時間，也有出遊和遠離世俗煩惱的自由，也許這種反應可視爲閨秀女子對生活中束縛表達不滿的一種方式，也是其渴望走出傳統角色的期待。

胡曉眞文章〈血債血償——女性彈詞小說中的戰爭暴力與愛情隱喻〉以彈詞爲材料，討論女性敘事作品中的戰爭主題及其延伸隱喻。文章第一部分「文才武德，一肩雙挑——彈詞小說中家庭與戰爭的平行結構」中，以《再生緣》和其前傳《玉釧緣》爲主，探討女作家對戰爭的描寫。作者認爲，女作家由於缺少親身經歷，描寫戰爭的文字較匱乏、瑣碎，無法正面處理戰爭場面，其戰爭書寫受到傳統舞台的影響，視覺娛樂性質較強。在第二部分「身披離亂的彈詞作者及其戰爭書寫」，作者認爲以明末或晚清世變動亂爲歷史背景的彈詞作品，如《天花雨》、《精忠傳》和《四雲亭》，其表現戰爭更加嚴肅。第三部分「戰場如情場——《榴花夢》中血的隱喻」中，作者聚焦彈詞中「血」的意象，探討該意象如何在戰爭與愛情的主題中，發揮雙重隱喻的作用。

本書最後一部分「個人與政治——回應現實世界」中，身處晚清特殊歷史背景之下的閨秀們，開始跨出自己身邊熟悉的小社會，放眼世界，回應現世政治。

〈閨秀與國家——十九世紀亂世中的女性寫作〉一文表明：十九世紀晚期以來，女性詩作愈加關注現實政治，挑戰婦言傳統。這些帶有政治意識的詩作，甚至可以說是近代「新女性」寫作之先導。本文繼承本書前文關於明清之際女性詩詞的討論，進一步探討十九世紀後半期女性詩詞中的意象。本文第一部分「君王事亦女子事——魯漆室女」指出，女性作爲政治主體的同時，也扮演得體的家庭角色，這種雙重角色定位是基於「魯漆室女」這個典範故事。第二部分「十九世紀詩歌中關於動蕩的意象」中，討論了女性詩歌中對西方列強軍事壓力的抗議、其對太平天國動亂的見解，而且其中充滿了女作家表達憤慨、絕望以及生離死別、背井離鄉的痛苦。「呼喚武裝」一節告訴我們，女性詩人面對現實困境，以謳歌女將手中寶劍的形式呼喚武裝，批判朝廷軍隊的軟弱無力。在「女性詩歌中的經世與時弊」一節，女詩人或將注意力集中於爲海事地圖作注，或創作了針砭時弊的詩歌，或對經世大計和社會問題發表意見。在結語部分，曼素恩首先談及十九世紀亂世中女性書寫的詩歌，給性別史學者帶來的三點啓發。之後，作者嘗試回答爲何正在覺醒的女性意識，極少能引起男性作家及文集編纂者的重視。最後，作者肯定了正是十九世紀這一代女性孕育了二十世紀早期所謂的「新女性」。

〈想像歷史和王朝——福建閨秀之居家與羈旅〉，以《閩川閨秀詩話》及《閩川閨秀詩話續編》中的女性詩作爲藍本，

通過女性作家的歷史品評及其對政治文化地理的生動再現，以此探究閨秀詩作中流露出的歷史和空間感悟。李國彤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這一概念，來展示閨秀對歷史和王朝的想像。福建閨秀對歷史和王朝的想像見於以下主題：風土景物、旅居和返鄉、親屬網絡。福建閨秀將風土景物融入思鄉詩句，以表達對家鄉的認同，而這種鄉土觀念卻會和更廣闊的邦界相連。而閨秀在旅居和返鄉過程中所寫詩句，或可啓發人們對外界王朝的想像；詩人或把自己所行之處嵌入王朝更廣闊的邦界；而女詩人隨父、隨夫、隨子宦游的經歷，或會促使她們把對天朝的認同感放進詩中。此外，作者以黃任的親屬網絡爲例，來解釋王朝的想像如何在家族成員中傳播：家鄉的鹿鳴宴慶典讓人們意識到遠方朝廷的存在，以及男性親屬效忠朝廷的服務。結語部分，作者揭示了閨秀的詩學傳統：閨秀與其他女性和男性文人共享的歷史感和文化資源。這也提醒我們閨秀傳統留下的遺產：那被民族主義敘述「忘卻」的政治意識。

〈薛紹徽及其戊戌詩史〉一文，以薛紹徽爲中心進行個案研究。錢南秀考察了薛紹徽的個人經歷和詩作，審視其對晚清社會政治變化的反應，並且揭示了清末婦女詩歌對傳統的繼承和創造性發展。「遭遇外部世界」一節中，薛紹徽的詩歌筆觸就因見聞廣博而跨出閨門之外。她寫詩詞來記錄、評論西方事物，憑弔馬江之役的草莽英雄，哀歎甲午戰敗割讓臺灣。「參與戊戌變法」一節中，作者一方面展示了薛紹徽對於「中國女子爲惰逸無用之輩」，和否定中國才女傳統觀點的批判；另一方面，介紹了薛氏對戊戌變法的看法。「婦

女與庚子事變」一節，則通過薛氏的六首詩文來揭示不同階層女性對這一事變的態度。在「考察新政」一節中，透過薛氏的個人實踐活動及詩文，向讀者展示了薛氏的參政熱情及政治理想。總之，薛氏畢生所作之詩文，既是其心路歷程的反映，也是了解清末政治、社會歷史的參照。而薛紹徽對於現實政治的關懷和對女學的提倡，更可謂是明清女作家之中「跨越閨門」的佼佼者了。

結論部分以雷邁倫和魏愛蓮的兩篇文章來總結全書。

雷邁倫的結論部分，首先爲我們回顧了明清之前女性寫作的傳統，進而闡釋了明清女作家群體如何漸漸形成，及這種作家身分對女性的意義。此外，雷邁倫也提出由明清女性詩文而生發出的一系列問題。同時，作者討論了女性文本、才女作品未獲認可的原因，女性著述的影響等問題。在述及明清女性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時，作者以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elix Guattari)提出的「小眾文學」(minor literature)[6] 的概念來說明這一問題，並具體論述「小眾文學」的三大特點，來與明清女性文學相對應。

〈閨閣及其超越：明清女作家及其對「小眾文學」的思考〉，則回應前文提出的「小眾文學」之概念，並以一種新的視角將本書 11 篇文章劃分爲四個部分，對全書內容進一步加以闡釋，以全新角度增加了我們對全書的理解，這一點可與本書緒論部分前後呼應。

---

6 Minor Literature 在此被譯為「小眾文學」，有時也被翻譯為「少數文學」、「弱勢文學」、「少數族文學」或「少數族裔文學」等等。

三、性別視角中的女性書寫——問題與展望

女性在歷史中的形象總是很模糊，甚至空白。關於她們生命歷程的生命史建構，偶爾可以在正史或地方史中找到些許雪泥鴻爪般的痕跡，但其中關於她們自己聲音的記錄和抒發可謂少之又少。本書中對於明清女性詩詞文學的發掘和解讀，爲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這些明清才女作家們的生命圖景，因而她們的生命史也漸漸被構建起來，即使這還不夠完整和足夠清晰。

在發掘女性詩文的過程中，女性記錄了自己在閨門內外的生命歷程：生病之時的脆弱無力，但也因此獲得了創作空間和靈感；家人去世之時，女性拿筆記錄下自己的哀痛，並且回憶以往與至親之人的美好過去；因編輯詩集的需要或是志趣相投，女性開始走出家門，與男性文人、才女詩歌互答，進行學思交流或是拜訪比丘尼，討論佛經、文學，收穫友誼；詩文中同樣記錄下女性的宦游經歷，在旅行中的見聞和家國想像；當社會和國家遭遇變故，詩歌裡便記載了明清之際戰亂頻仍的恐懼，和逃難過程中家族離散的悲劇。詩詞中還記錄了在晚清變局中，女性如何認識西方，並且親身參與清末變法的經過。這些作爲女兒、妻子、母親的明清女作家，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寫下關於自己生動的生命歷程的詩文，以一種些許含有自傳意味的文學方式，留給後人構建她們生命史的素材。

女性的書寫活動顯示了一種歷史能動性，她們對詩詞和學識的喜愛與追求，也許賦予了她們的自我價值感，也許也

漸漸生發出一種文學的自覺和文字使命感。她們編輯女性詩集，或是出於詩教的社會目的，或爲彰顯女性才能，給女性的文學作品提供發表的平台。文字使命感也使得她們開始思考、評論現實問題，跨越傳統性別框架，關心現實政治。書中對明清之際和十九世紀女性詩文的研究都說明，在家國動蕩的年代裡，女性並非是歷史的旁觀者，雖然礙於性別身分，他們無法上戰場與敵人抗爭，無法入仕討論經世致用之策，但她們卻顯露出對現實世界的關懷。至於對薛紹徽的研究，更是說明女性親身參與了推動變法革新的運動。上述種種也因此可以駁斥近代以來認爲才女作家無知、膚淺、缺乏公共意識和政治關懷的淺見。[7] 同時，雖然人數有限的明清閨秀並不能代表同一時期所有的女性，也不可能完全顛覆我們對中國古代女性遭受壓迫的印象，但閨秀們多樣豐富的詩文寫作和人生經歷，也足以爲我們了解當時的女性歷史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傳統五四觀念中對全體女性都遭遇不幸的認識，也可得到質疑和修正。[8] 從文學史的角度而言，因以往

---

7 近代以來，以梁啟超等為代表的人士批評閨秀傳統，本書中也多處提及（見本書第 48、305、317 頁）。應當指出，梁對才女的批評中，也許固然存在其對閨秀傳統的曲解，甚至是性別偏見。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梁把才女、閨秀視作中國的「舊傳統」，通過否定傳統來宣傳其維新變革的政治主張。梁把閨秀視作舊傳統，割裂了其與中國現代及未來的關係，從而推崇「新女性」；而本書卻在提醒我們關注明清閨秀和二十世紀新女性，在諸如性別覺醒和自我意識等方面的繼承，當代學者試圖挖掘被我們忽視的閨秀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緊密聯繫的一面。關於梁啟超否定閨秀傳統的分析，請進一步參看，胡纓，〈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9（2001 年 8 月），頁 7-11。

8 關於對五四婦女觀的反思，請參看《閨塾師》一書的緒論部分——從「五四」婦女史觀再出發。

受進化史觀和男性意識的影響，由女性書寫的大量詩詞在重視小說、戲曲的明清文學史中被忽略，希望將來在重新審視文學史的發展時，這些曾經沉默的明清女性作家，能在文學史上留下自己獨特的一筆。[9]

本書以明清女性作家的詩文爲中心，題材多樣，涉及疾病、友情、愛情、宗教、羈旅、戰爭、政治等多個方面，爲我們展示了明清才女們閨閣內外多樣的生活空間和精神世界。就文類而言，本書涉及的文章以談論詩詞爲主（也有一篇談到彈詞小說），也許今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發現明清才女創作的散文、小說等，以多文類的書寫文本展示才女的寫作生涯。

從地域而言，書中所寫才女大多來自中國南方地區，尤其以江南地區爲多。根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中記載的留有著述的明清女作家，和曼素恩在《綴珍錄》中對清代女作家的地域分布做的統計而言，我們大致可以推測明清女作家可能主要來自長江中下游地區。[10] 雖然北方地區也有一定數量才女的存在，但目前而言還沒有得到充分研究。以北方爲中心的才女群體和江南地區的才女，在寫作和生活經歷上又有何種相似和差異之處？地域和民族的差別又會對才女的形成和寫作偏好產生怎樣的影響？上述問題有待我們

---

9 民國至今，已有關於女性的文學專史著作出版，如謝无量的《中國婦女文學史》、梁乙真的《清代婦女文學史》及《中國婦女文學史綱》、蘇之德的《中國婦女文學史話》、譚正璧的《中國婦女文學史》、張明葉的《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簡史》等等，但目前大多綜合性的文學通史還是甚少涉及明清女作家。由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已經開始把明清女性作家納入其文學史書寫的正文之中。

10 曼素恩著，定宜莊、顏宜葳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 290。

今後進一步思考。[11]

---

[11] 在北方才女的研究中，主要是涉及才女群體和才女個案的研究。關於女性詩人群體的考察，參見董倩倩，〈清代孔氏家族女性詩人詩作綜考〉（曲阜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0 年 5 月）；姚金笛，〈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詩文研究〉（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3 年 5 月），頁 207-245；石玲，〈清代曲阜孔氏聖裔女詩人論略〉，《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期 3（2013 年 6 月），頁 45-52；李豫，〈清代山西婦女詩人考略〉，《山西文獻》，期 38（1991 年 7 月），頁 46-61；李鼎文，〈清代張掖的女詩人〉，收入《甘肅文史叢稿》（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頁 135-140。關於北方才女個案的研究，見嚴安正，〈明清時期秦東四位女詩人〉，《渭南師範學院學報》，期 1（2005 年 1 月），頁 46-48；鄧丹，〈清代女曲家王筠考論〉，《戲劇》，期 4（2007 年 12 月），頁 71-79；商松石，〈明代女詩人邢慈靜〉，《東岳論叢》，期 2（1990 年 4 月），頁 108；李瑩，〈王照圓《列女傳補注》研究〉（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1 年 5 月）；劉玉偉，〈王照圓詩經學研究〉（聊城大學中國古代文獻學碩士論文，2014 年 4 月）；周瀟，〈清末山東才女李長霞與膠州柯氏〉，《山東高等教育》，期 2（2014 年 2 月），頁 75-85 等等。總體而言，相比於南方才女，學界對北方才女的關注有限，此領域仍有較大研究空間。
關於少數民族的女詩人，請參看張佳生，〈清代滿族女詩人概述〉，《滿族研究》，期 1（1989 年 4 月），頁 80-86；祝注先，〈清代滿族、蒙古族的婦女詩歌〉，《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4（1997 年 10 月），頁 82-86；朱吉吉，〈清代滿族女詩人研究〉（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1 年 5 月）。關於少數民族女詩人的個案研究主要涉及顧太清、佟佳氏、納蘭氏、齡文等人，參見黃嫣梨，〈顧太清的思想及創作〉，《社會科學戰線》，期 2（1993 年 6 月），頁 244-249；卓清芬，〈顧太清東海漁歌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7 月）；張雅芳，〈文學生命的建構——顧太清及其詩詞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董文成，〈傑出的滿族女詩人佟佳氏〉，收入遼寧大學中文系、歷史系主編，《滿族論叢》（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6），頁 122-137；莫立民，〈佟佳氏與《虛窗雅課》〉，《滿族研究》，期 4（2010 年 12 月），頁 77-81；紅鶯，〈滿族女詩人納蘭氏〉，《滿族研究》，期 2（1995 年 6 月），頁 24；高興璠，〈清代滿族女真詩人齡文〉，

從社會階層而言，明清才女主要出身士大夫階層，相對而言，貴族女性或中下層女性的文學世界則缺乏關注。下層女性雖因家庭條件的限制，難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也無餘力出版文集，但近來關於女性口傳文學和女書的研究，也許可以提供些許思路。[12]

關於文中用來解釋歷史和才女文學所涉及的理論問題亦值得注意。〈由私人生活到公共展演〉中談到「集體自傳」、「銘刻作法」、「副文本」等概念；李國彤借用「想像的共同體」來解釋閨秀們的歷史和空間意識；雷邁倫談到明清女性文學時，以「小眾文學」來闡釋明清女性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跨學科理論對歷史的綜合概括，固然可以加深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但正如盧葦菁在〈美國中國婦女研究評述〉中所指出的那樣，北美的中國婦女史研究所涉及到的社會性別理論、概念和研究方法，主要來自西方，如果運用不當，可能出現生搬硬套和偏頗失眞的毛病。[13] 因而，理論在歷史解釋中的謹愼使用同樣值得重視。

此外，以往我們關注二十世紀「新女性」的形成如何受到西方的啓蒙，本書的作者則引導我們從中國文化的內部和

《滿族文學》，期 2（2007 年 3 月），頁 58-62 等等。

12 關於平民女性詩人的研究較少，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婦詩人賀雙卿身上。參見周婉窈，〈綃山傳奇——賀雙卿研究之檢討與展望〉，《新史學》，卷 7 期 4（1996 年 12 月），頁 159-197；李金坤，〈賀雙卿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 13 期 4（2003 年 12 月），頁 67-89；杜芳琴，《賀雙卿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胡煦，〈賀雙卿研究〉（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1 年 4 月）等等。

13 盧葦菁，〈美國中國婦女研究評述〉，收於張海惠主編，《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506。

明清女作家自身，來發現那種促使二十世紀「新女性」生成的力量。本書曾多次闡發這樣的觀點：明清女作家的政治覺醒和對現實關懷的趨勢，在晚清和二十世紀初發展成女性對政治的直接參與，明清女性著述被看作是孕育了後來幾代作家的一個歷史轉折過程。二十世紀的新女性精神，與前幾個世紀的閨秀傳統之間的歷史傳承與斷裂究竟如何？閨秀傳統如何轉化爲影響二十世紀「新女性」的精神財富？在外來衝擊之下和國門打開之後，西方精神和閨秀傳統如何交融共存？上述的發問仍需我們對才女傳統的歷史脈絡進行更加精細而深入的刻畫。[14]

本書最後，雷邁倫運用「小眾文學」的概念，從一種理論高度揭示了明清女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雖然這一理論存在解釋上的局限，如魏愛蓮所說，「小眾文學」不足以涵蓋女性從事的諸如刺繡、繪畫、編輯出版、哀悼等與文學無關的活動，但「小眾文學」背後揭示出女性面對的問題和困境，卻是相似的。對這些問題和困境的進一步探索，也將成爲日後努力的方向。

正如季家珍(Joan Judge)在給本書英文版所寫書評中所感慨的：本書的豐富性不僅在於其對文本謹慎的解讀，不僅在於其對明清歷史細緻的追溯及其提出的強有力的觀點，更在於本書饋贈給我們一連串值得思考的問題。[15]

---

14 目前有文章探討明清之際的婦女解放思想，但其聚焦於明清士大夫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男性代表之間的思想連續性，參見李國彤，〈明清之際的婦女解放思想綜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1995 年 8 月），頁 143-161。

15 Joan Judge, “Book Review-*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 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hrough Qing*. Edited by Grace S. Fong and Ellen

四、餘論——對數位人文研究的省思

文本的獲取對於研究明清女性作家的書寫和生活至關重要，特別是獲得女性自我書寫的文本。然而，因女性作品多以孤本手稿或稀有圖書副本的方式存世，大部分明清女性的詩文仍然遭到忽視。爲使更多學者獲得關於明清婦女著作的一手材料，從 2003 年到 2005 年，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和哈佛燕京圖書館合作，聯合實施了數字化計劃，建立了「明清婦女著作」(Ming Qing Women's Writings)數據庫及其網站。[16] 本書就是眾多學者通過描述、考察這個數據庫中收藏的寶貴史料，進而產生的理論成果。本書大部分文章皆參考了本數據庫中所收錄的女性著作，或是使用關鍵詞檢索詩文主題詞，或是集中閱讀其中收錄的特定文集。

大規模運用數據庫中收錄的罕見資料進行研究，可謂是

Widmer,"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53 (July 2011), p.346.

本書中文版在出版印刷時出現了部分錯誤，列舉於下，以供修改參考。第 91 頁，「1891 年至 1851 年的作品」，其中應將「1891 年」改為「1819 年」；第 176 頁注釋 5、第 188 頁注釋 7 注釋格式似有誤；第 195 頁注釋 2《吟紅記》應改為《吟紅集》；第 209 頁「王端淑完全是出於無奈才出家為尼的」，其中「王端淑」應改為「王靜淑」；第 278 頁，「忠臣節鉞鎮岩疆」一句中，「忠臣」應改為「重臣」。

16 麥基爾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目的在於為學術研究提供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書中珍貴的明清婦女寫作詩文集的在線接入。本網站正是該合作計劃的直接成果。作為接入和保存的有效方式，同時也作為學術研究的寶貴資源，本網站包括由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檔案數字圖像組成的虛擬圖書館，並由麥基爾大學設計和實現的在線學術資料進行增補。本數據庫大致收集從晚明到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的女性詩文作品。數據庫網站見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查詢時間：2014 年 6 月 25 日。

「數位人文」[17] 的發展結果。以電子數據庫爲代表的「數位人文」的發展，使原先百尋不得、難有機會閱讀的書籍，得以在網絡中取得，也使得資料的流通和存儲更加方便。不過，數據庫部分功能的使用也需引起我們的警醒。例如，關鍵詞檢索功能會引人詬病。這是因爲容易造成對資料整體感的喪失，不同於人工閱讀的逐字逐句，使用者應用資料庫找尋資料，往往都是「中了就跑」，資料相當程度上變成關鍵字的組合，抹去了傳統閱讀過程中整體的感受及觸類旁通的可能。一條條針對特定關鍵字檢索的結果，取代了對資料全面的細讀，容易造成研究者視野窄化，也失去了對資料背後整體時空脈絡的認識。人文研究應在數位工具的協助和刺激下，去除盲點，深化對史料的理解，如果只是單方面依靠數位工具，將會失去資料間的脈絡，亦無法判斷史料本身所具有的複雜層次。即使是「檢索關鍵詞」這個今日使用資料庫的基本，也需要兩者來回往復，才不會被關鍵字所限制，喪失了整體脈絡。[18]

〈書寫與疾病〉一文通過在數據庫中檢索關於「病」等字的關鍵詞，來尋找女性關於疾病體驗的書寫。此種檢索方式能快速查找到所需資料，以便進一步細細探察、審讀，但美中不足的是，假若女作家未在文中直言病情，只是隱含吐

---

17 「數位人文」可簡單理解為：在學術社群逐漸形成的共識當中，數位人文是結合數位材料，運用資訊科技來從事人文研究的新興領域。項潔、陳麗華，〈數位人文：學科對話與融合的新領域〉，收入項潔主編，《數位人文研究與技藝》（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11。

18 王汎森，〈數位人文之可能性及限制——一個歷史學者的觀察〉，收入項潔主編，《數位人文研究與技藝》（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32。

露，以隱晦筆法書寫疾病體驗，怕便檢索不出了。此外，該文意在研究這種將疾病與寫書聯繫在一起的書寫模式，可是僅僅通過研讀女性病中詩句，而不涉獵女性健康時刻心緒的抒發，恐怕會有所遺漏。特別是針對同一位女性詩人，如果對其健康、患病、病癒後幾個不同階段詩文書寫模式進行對比，以求對其詩文有整體把握，如此而來，我們是否會對疾病與女性書寫聯繫在一起的書寫模式有新的發現呢？

此外，也有學者擔心使用數位數據庫會扼殺研究的延伸性。過去以傳統方式尋找資料，學者接觸史料的過程可能會發現新的研究脈絡，而如今因爲資料容易獲得，使研究成爲一種速成，不再有「厚積薄發」的深度，因而可能會忽略關鍵詞外更遼闊的世界。[19] 就本書而言，文章的資料使用大多只涉及對數據庫的傳統應用，上述提出的問題並不明顯，但對數位人文的省思卻不應就此而止。

---

19 項潔、翁稷安，〈數位人文和歷史研究〉，收入項潔主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19。